

《当代中国经济》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三重逻辑

姓 名 宋晓雨

学 号 2021102001

学 院 经济学院

专 业 政治经济学

日 期 2022 年 12 月 24 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三重逻辑

宋晓雨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践所做的一项重大理论创造，也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重大实践探索。基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在资本的双重属性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剖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性质、作用及其行为规律的阶段性演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实现了伟大飞跃。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对资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其资本政策也历经否定和消灭资本阶段——支持和运营资本阶段——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的发展历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与资本政策互为助力相辅相成的真实写照。针对新发展阶段下资本无序扩张的表现与特征，立足实践，实事求是，坚持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健康发展 三重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强等多重叠加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重大论断，^①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当代价值。这一论断既为揭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又为扎实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实践方向。

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资本逐利的天性引致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有现象，这点在技术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也开始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等层面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一直是党和政府制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前提，也是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运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变化，全面梳理和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政策的历史演进，在理论、历史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讨如何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克服其内在的生产性矛盾，不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新时代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的形态及其功能也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所有制下，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遵循不同的经济规律。为此，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核心在于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并对资本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渊源有清晰的认识。

（一）资本是一种物化的生产关系

^①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商人以及商业资本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变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商主义聚焦商业资本形态,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货币,资本的运行规律也如同货币一样,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产生增值。针对重商主义将资本等同于货币,仅存在于流通领域的局限性,重农主义学派将资本的研究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魁奈作为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将农业生产的资本划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个部分,实现了货币与资本的分离,但他仅将资本与农业生产相联系。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的大发展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资本的本质。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的配第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开始认识到货币与资本的区别与联系,并认为货币并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值,但资本却是“下蛋的母鸡”。他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表明了劳动对于社会财富增值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开始从劳动的角度来解释资本的来源和积累,但他们都将资本与生产资料等同,混淆了资本与资本的物质形态,忽视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学派的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与构建,指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②并给出资本“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一般规定性,“也就是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使人们对资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③与西方经济学将资本视为一种单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是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一种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定义在体现资本的生产力属性的同时,还深刻剖析了资本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露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

可以看出,资本作为一种物化的生产关系,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资本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根源于其能够作为生产要素和使用价值本身而存在,“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④资本不停运动的过程就是使用价值不断积累的过程,从而持续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的基础。资本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具体过程就是“资本作为流通着的使用价值本身”同劳动结合起来,以商品作为流通的起点,“既把自己的物质存在设定为消费品,又设定为新的生产要素,或者更确切些说,设定为再生产的要素”,^⑤并将生产的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和再生产系统,从而在追求增殖的运动过程中永不停歇地创造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促进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鲁品越和骆祖望,200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感慨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换言之,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商品使用价值的增加。它更多地同资本的物质形态有关,体现着资本的生产力属性。另一方面,资本具有逐利、积累和扩张的天性,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一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定条件下,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⑥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⑦同时会带来剥削与异化等消极作用。

① 斯密将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而积蓄起来的财富,但并未探讨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也没有深入研究资本创造物质财富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关系。李嘉图则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参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87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资本作为“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是因为“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①基于对“一切剩余价值……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的认识，资本从本质上看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②而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相对于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总体权力，正是由资本自身的逐利性、积累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等基因所天然赋予的。这种总体权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表现为资本不仅对剩余价值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同时还可以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其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资本剥削劳动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如果不对资本这种与生俱来的支配性地位加以限制，不仅会带来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而且会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干扰和风险，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和人的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澄清当时人们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一些模糊的、片面的认识，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他指出“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已是贴近社会主义的前阶”，^③但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生产关系属性并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形成和统治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他认为金融资本“是最大的、发展到垄断地步的、同银行资本融合起来的工业资本”，^④并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⑤

从上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资本的研究对象限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蒋学模，1994）。马克思列宁主义构建的资本理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理论源泉，对于我们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具有合理性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想来看，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需要资本的存在。一方面，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将“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⑥这使得个人的劳动将直接演变为同质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劳动产品也不再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说，未来社会中商品生产将不复存在，资本存在的经济基础和前提条件不再成立。另一方面，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不再需要发挥资本创造物质财富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资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但是，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具有合理性。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赋予了资本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资本是市场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必要前提。“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⑦而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64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必然存在，即社会主义不可能绕过市场经济（荣兆梓，2017）。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享有人身自由且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货币转化为资本提供了前提条件，满足了资本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存在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人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所有制的多元性和混合性相对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和混合资本等各种不同性质的资本，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经济发展尚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我国脱胎于以落后农业为基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从生产力极大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本质差别。因此，我国必然要经历“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①的特定阶段。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充分肯定了生产力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际需要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正是源于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资本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基础要素，同时也是黏合其他生产要素、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工具，具有创造物质财富和剩余价值的重要功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逐利和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其对价值增殖的不懈追求，这在客观上提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只要资本不停止运动脚步，社会物质财富和价值的积累便是源源不断的。因此，只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未到来，资本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最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的形势必要性。列宁最早提出了要借鉴和吸纳资本主义有益部分的思想，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③首次阐明了利用和学习资本主义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并最终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基于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国内的新形势，邓小平也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④这一论述肯定了我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下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澄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资本作为工具和方法的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体现的不再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尖锐的利益对立和剥削关系，而是资本与劳动平等地作为生产要素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经济关系。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⑤明确了大国关系错综复杂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并没有变的事实。新时期，增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互鉴，吸纳其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继续允许资本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与规范资本发展，依然是充分发挥各类资本参与国际竞争积极作用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资本存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8 页。

④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 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其现实可能性、客观必然性和形势必要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践所做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创造。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调整与变化，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答社会主义社会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伟大飞跃。^①这一伟大飞跃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准确等方面。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从无到有”的飞跃。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强调了坚持公有资本主导地位和非公有资本补充作用的重要性，为运营资本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清醒认识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照搬苏联”和“以苏为鉴”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行不通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的观点不利于我们释放生产力的潜能、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②区分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为之后引进外资和运营资本做好了铺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邓小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强调了公有资本的主导性。同时，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③的先进思想逐渐获得广泛认可，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对公有资本之外的其他资本的性质认识尚不清晰，也未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性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第二，肯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为资本正名。随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重大论断的提出，邓小平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不同性质资本存在的必要性，鼓励多搞点“三资”企业，指出“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④随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进一步将资本与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肯定了资本存在的当代价值，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营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三，准确把握了资本日益融入全球化与金融化进程的行为规律。在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工作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遇到新的挑战。”^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给我们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大量资金的同时，又带来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党中央渐渐意识到加强资本运营与监管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的重大突破，完善了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从有到优”的飞跃。第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性质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

① 虽然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有过利用外国资本调节生产的积极尝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利用私人资本的实践探索，但他们都未能针对公有制能否与资本结合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仍处于空白阶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④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4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本的特性。新的时代条件下，基于对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相对应，我国现阶段“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性质的资本，^①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②。这一论断在突出公有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我国资本特性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各种性质资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提高资本治理能力的指导思想。第二，既强调要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看到资本逐利本性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基于对国内外新形势与新变化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清晰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③这一理念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提供了理论遵循。第三，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资本行为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的现象，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任平，200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④这一论述既突出了新发展阶段下我国资本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又指明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行为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反腐败等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主攻方向。近年来，面对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为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国务院在2022年5月31日发布了《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指出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前提下设立‘红绿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⑤这是党中央准确研判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与新变化，对资本内涵的认识不断拓展，对资本行为规律的把握逐渐深入的重要体现，是认识和把握平台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的有益尝试。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历史逻辑

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和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不同时期下的资本政策也随之调整，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否定和消灭资本阶段、支持和运营资本阶段、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等。系统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演变历程，剖析资本政策转变背后的逻辑，对于深入总结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准确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全面提高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否定和消灭资本阶段

中国共产党作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与资本政策紧密交织。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囿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与挽救民族于危亡的迫切性，中国共产党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性与前途的黑暗性，但却将资本主义的罪恶笼统地归于资本的罪恶，认为资本乃是工人阶级遭受剥削与掠夺的本源，故而其资本政

①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 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人民日报》2015年9月16日第1版。

③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④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⑤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31/content_5693159.htm。

策也表现为明确的排斥和没收资本。但是，党内也有人意识到一味排斥资本的直接后果就是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其资本政策也转变为利用资本，并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后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利用资本的政策实际上是指允许资本在一定范围内活跃，即资本的发展是有界限的，节制资本的思想也并未消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政策变化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制定与调整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政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一化三改”的提出虽然符合当时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但在宣传和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片面化和冒进化的倾向，忽视了当时生产力低下和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和必要性（鲁振祥，1990）。为了尽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指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②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③这种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认识严重背离了我国仍是落后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忽视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性，将资本从社会生活各领域彻底赶出去的态度也将极大程度地限制生产力发展。具体来看，国家主要针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并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④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地位。至此，“资本”的概念在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中被“资金”或“资本金”取代，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性名义上都被消灭了。究其原因，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中国而言，国际上缺乏可借鉴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⑤实际上，不管是“照抄苏联”，还是“以苏为鉴”，都未能逃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不存在市场和私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用三年时间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毕其功于一役”偏离了毛泽东大约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这一任务的设想，过渡时期过早地结束也为之后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长期存在埋下了隐患。

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来，否定和消灭资本的政策便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在此期间，虽然党中央提出过纠正思想的尝试，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八大根据国际国内新形势对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决策。^⑥但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的基本纲领也迅速发展改变（刘伟和范欣，2022）。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甚嚣尘上，国内先后出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斗争。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更是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分析，认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2页。

④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其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2009：《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经济研究》第11期。

⑤ 《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⑥ 《党的先进性建设系列研究》上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页。

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①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掀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狂潮，消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取缔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等政策全面施行，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公有制，资本已处于完全被消灭的状态。

（二）支持和运营资本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关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资本的复归提供了体制保证。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遵循“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对资本全盘否定和一刀切的做法不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采取了支持和运营资本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资本政策主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而展开。

从本质上看，资本政策变化的根源在于党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不清，具体表现为将资本与市场均划归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否定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否定和消灭资本的政策既不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也无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②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③肯定了私有制和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发出了新时期重新为资本正名的先声。伴随着从农村到城市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④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甚至要发展商品经济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重大判断为发挥资本生产力属性提供了现实可能。同时，全会还倡导“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极大地助推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沉睡多时的各类资本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此外，针对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认为资本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在理论层面澄清了资本的中性问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运营资本的历史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对资本的认识也在正确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政策手段也日趋多元化，主要体现在：第一，鼓励不同所有制类型的资本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⑥肯定了各种性质资本参与分配的合法性，强调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资源配置，并在促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一种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民普遍贫困的状态。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7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4元。不论是从经济总量来看，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巨大差距。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需要调动一切因素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本政策从否定和消灭资本转为支持和运营资本成为了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⑥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进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此后，为了充分激发资本活力，党和国家还陆续出台了鼓励不同性质资本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完善结售汇制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①“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②等。第二，发展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机遇迫切要求我们发展资本市场。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曾提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③资本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延伸，体现资本功能的事物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随着资本“祛魅”的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开启了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积极尝试。^④随着对资本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二十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从“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有利于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改组，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维护金融安全”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为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和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⑤第三，加强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党和国家着重强调要实现“加强管理、扭亏增盈和提高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为了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1996年3月，国务院指出要“切实强化资金和成本管理，提高资本运营效率”，^⑥要求国有企业积极开展资本运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温家宝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⑦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

新时代以来，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新时代要“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的重大论断，^⑧标志着资本政策进入了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政策主要围绕着继续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本协调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方面展开。

第一，新时代继续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相适应，我国现阶段的资本也存在多种类型。党中央在遵循公有资本主导性的原则下，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为了更好地促进各类资本共同发展、激发各类资本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⑨在强调国有资本改善民生、支持科技创新和保障国家安全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首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范畴，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

②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页。

⑥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页。

⑦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⑧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⑨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补短，扩大了非公有资本的活动范围，充分调动了非公有资本的积极性。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发展阶段，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①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做出了精辟概括，明确了新发展阶段下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依旧要坚持立足于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定位。

第二，高度重视不同形态的资本协调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平台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新型资本形态相继涌现。为应对虚拟资本肆意扩张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许均华和高翔，2000），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②拉开了维护资本安全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序幕。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冠疫情冲击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基于对资本行为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指出“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③既强调了实体经济的关键核心地位，又提出了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倾向的基本构想。随着金融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其他领域，资本“脱实向虚”和虚拟资本野蛮生长问题所可能诱发的系统性风险愈发引起重视（洪银兴，2009；洪银兴，2022）。面对金融资本规模的迅速扩张和与日俱增的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着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克服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重点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泡沫风险等”，^④标志着重视不同形态资本协调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针对资本、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2017和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指出“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⑤和“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⑥，突出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展示了促进资本有序流动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

第三，注重规范资本行为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垄断、“大而不倒”、资本与权力联姻等新情况与新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资本发展中产生的经济“脱实向虚”、泡沫风险、市场垄断等各种问题已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利益，甚至会威胁到国家和社会稳定。为了“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鼓励各种经济业态的健康有序发展，党中央特别强调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为各类资本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行业生态。^⑦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⑧发出了规范资本行为的时代强音。随着党中央对资本作用认识更趋全面，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①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人民日报》2017年4月22日第1版。

④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⑤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第1版。

⑥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2日第1版。

⑦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⑧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

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①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关于资本问题的首次系统论述，既肯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积极作用，又指出了资本具有内在的生产性矛盾，“红绿灯”的设置则代表了党中央规范资本行为的初步构想。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与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密切相关的一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的制约手段”，防止资本对国家安全的侵蚀。^②面对新时代资本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资本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准确把握，从“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和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五个方面作出了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指示。^③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问题的初步共识基本形成，对新时代资本的定位、作用和发展路径也有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阐述。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以来，我国资本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资本与权力相勾连、经济“脱实向虚”、市场垄断加剧等问题，而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所必然要做的事情，绝不能简单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一个简单的政策变化、战略变化（刘元春，2021）。为此，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共同富裕相统一的实践逻辑。

（一）实践保障：坚持党的领导

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巩固和扩张利益的诉求会诱发资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权力的侵蚀，形成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基于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资本会在不懈追求剩余价值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力图介入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争取获得尽可能高的政治影响力，并力争把这种政治影响力转换为自身的利益。纵观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镀金时代”相伴而生的往往是超级腐败，是资本对政治过程的极度干预，甚至会出现资本利益绑架国家利益的现象。

回顾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资本的运营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期间也不乏资本对政治权力的干涉，如贿赂政府官员、政治掮客受到权力庇护、凭借政治人脉规避监管等。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严格把关党员素质，紧抓党员干部培养，力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凝练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妥善处理资本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重要保障。此外，党还不断从执政能力、先进性和制度等方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辩证看问题的能力也使得党中央在接受和肯定资本发展生产力积极作用的同时，注意到资本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反复强调要加强资本的运营与监管。近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规模的不断增长，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并以权钱交易方式围猎权力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当前，资本干政主要存在资本干预选人用人、资本影响政策制定、资本干预政策执行和资本利用政策漏洞规避监管等多种形式，并具体表现为拉票贿选、资本和权力的“俱乐部”影响

①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3期。

③ 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2版。

政治过程、“立法式腐败”、利用职权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等操作手段。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才能彻底斩断资本与权力勾结的纽带，真正实现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的健康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处理好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解决资本与权力“联姻”问题的政治保障与根本支撑。首先，要加强新形势下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统一领导，有效预防资本俘获管制。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国有资本为抓手，强化对国有资本的监督和引导，同时巩固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和健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激励机制，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的重大决策和选人用人，肃清资本干政的源头。其次，要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完善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体制，有效避免资本对政治的干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自觉培养拒腐防变的意识，提高抵御诱惑的能力，才可能真正摆脱资本对权力的干涉，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最后，要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高度重视政治生态问题。只有加强针对资本与权力勾结相关领域的反腐败，加大力度严惩政府官员以权谋利的腐败行径，坚决打击资本倚仗权力肆无忌惮逐利的不良行为，才能尽可能规避资本干政带来的包括弱化国家治理能力、导致官员腐败、威胁政权安全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二）实践依据：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渐趋加大、逆全球化浪潮涌现愈演愈烈、大国关系日趋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资本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导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容易带来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资本逐利的天性会衍生出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即只要能够获得充足的利润，资本并不在意具体的投资领域。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提高，造成企业经营收益下降，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则具有相对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资本更多转向金融领域来获取收益，整体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日益凸显，从而产生经济泡沫，带来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虽然本质上金融过程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是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的，这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分离，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倾向，进而削弱了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除了转向金融领域，部分实体企业也会通过改变经营范围的方式，凭借金融活动获取收益。随着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金融行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非法集资问题也将扰乱金融秩序，甚至引发实体经济空心化等问题，产生巨大的经济运行风险。

事实上，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毛泽东节制资本的主张，还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对严格规范资本市场发展和加强资本运营与监管的重视，都说明党中央防范资本可能风险的意识从未消除。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有效防范经济风险的需要，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资本是生产要素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科学认识，并积极引进外资，鼓励不同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充分激发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同时，党中央坚持全面辩证看问题，不仅重视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一面，也秉持着对资本无序扩张的警惕态度和防范意识，开启了运营资本、加强资本监管、稳步发展资本市场、维护金融安全的初步尝试。近年来，随着虚拟资本规模总量的不断增长，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不断加剧，更是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庞氏骗局”、2015年股灾等严重威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事件。因此，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引导资本流向、规范金融秩序、促进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

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是新发展阶段下从容应对资本发展新问题，克服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依据。首先，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双重属性，发挥资本生产力属性层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限制其

带来的人的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消极作用。要以不断创新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来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协调发展,同时警惕其可能带来的限制人的发展等消极作用。其次,要深入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效防范资本虚拟化和金融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不同形态资本协调发展,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重要科学论断,引导更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和生产领域,充分发挥资本促进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为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强基固本。最后,要厘清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生产性领域的真正繁荣,提升整体经济的硬实力。在我国金融化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更要加强资本治理、引导资本流向、规范金融秩序。这样金融才能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加速器”,我国资本的“文明面”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显现。

(三) 实践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

资本利用监管漏洞,也会向民生等非经济领域侵蚀和扩张,逐渐偏离其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导致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影响人民福祉。由于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在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时,部分资本就会尝试进入一切有利可图的领域,如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和娱乐等行业。这些领域在承担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职能之外,还担负着知识与文化的传承、基本人权和社会公平的保障、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引导等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关系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重要方面。这在本质上要求进入这些关系着国计民生领域的资本不能为了获取收益而不择手段,而要与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匹配,积极承担其社会责任,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究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目的归宿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导逻辑,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人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原则要求资本发展本质上要服务于人的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提出,私人资本对进入医疗、教育、娱乐等领域的态度从最初的“左顾右盼”慢慢转变为“大胆涉足”,私立医院、民办学校、私人社交媒体等新事物不断涌现,但私立医院虚假宣传、医生执业资格造假、学校滥发毕业证书、民办教育质量不高、新媒体肆意引导和操控舆论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为此,党中央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①的战略方针,并采取了完善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党对相关工作的领导能力、强化相关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等针对性措施,将是否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②既看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又强调了要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但是,医疗、教育、娱乐等领域近年来出现的“莆田系”医院的扩张、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庞大的教培机构、“饭圈经济”、娱乐明星的天价合同、阴阳合同以及偷税漏税等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向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超越资本逻辑、约束资本行为、实现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则。首先,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能力,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完善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资本准入制度,严格把关资本市场入口,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参与感和幸福感。要兼顾活力和秩序,立足行业类型,设置“红绿灯”要有清晰透明的规则与科学合理的界限,做到精准施策,真正激发资本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增进人民福利的作用。

^①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其次，要完善企业 ESG 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资本履行社会责任、遵守社会道德的要求与约束。在明确 ESG 内涵的基础上，完善 ESG 的标准，建立和完善 ESG 信息披露制度，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开展 ESG 评价，同时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加强资本履行社会责任和遵守社会道德的约束，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引导资本发展真正惠及人民。最后，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和引导资本主体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真正实现资本的道德向善。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体不再是万恶的资本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手中的资本积极承担其社会责任，服务于社会目标，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实践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资本的过度积累容易形成市场垄断，以平台资本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更是提供了产生新型垄断的土壤，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的扩大。一方面，资本对超额垄断利润的追求会促使其力图获取更多的“垄断势力”，从而导致在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后出现资本集中的现象，最终形成资本的垄断问题。一旦形成垄断，资本便可以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通过价格策略、合谋行为等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或使同行业其他企业处于从属地位，并通过设定垄断价格等从关联企业和消费者手中获取更多收益（谭洪波，2022）。这在整体上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资源和财富向拥有垄断势力的少数人集中，扩大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资本还会扩张自己的垄断范围，将更多的行业和领域纳入到自己的垄断范围，进而影响竞争和创新过程，降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长远看将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观来看，市场垄断势力的获得通常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每一次技术进步却往往会伴随着两极分化的出现。例如，世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次工业革命时期，虽然诞生了众多先进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但也加剧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财富向少数人的倾斜，其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两级分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纵观我国的经济史，不难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党中央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现实需求，既坚持利用资本和发挥不同类型资本活力的主基调不动摇，极大程度地发展了生产力，又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做出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的科学决策。此后，党在十九大基于对国际国内新形势的科学研判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这意味着新时代我们不仅要积累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而且要注重发展质量，不断开创美好生活，尽早实现共同富裕。但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特性催生了新的垄断，大大缩短了市场垄断形成的时间，并孕育了平台资本这一新的资本形态。同时，平台资本不仅会凭借自身的流量和数据优势排挤市场上的其他企业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而且会通过数据和算法优势对消费者采取精准的价格歧视以转移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结构，使得财富差距不断扩大（谭洪波，2022）。因此，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权衡好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对于破除市场垄断、促进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现共同富裕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统筹效率和公平的最终目的。首先，要依法依规加强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26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形成资本监管的全领域、全链条式覆盖，维护市场秩序。只有运用法治化手段严厉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为各类资本的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经济效率，做大做好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更好地发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纽带的重要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具体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不断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公平竞争等基础性制度，从而打击垄断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同时，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纽带，不仅有利于在同等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还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构成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财富持续增加的良性循环系统。为此，我们更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前提条件。最后，要妥善处理资本与利益分配的问题，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探索更加完善的资本回报方式。要在社会分配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保障资本在分配过程中获得合理增殖，兼顾效率与公平，做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制度安排，致力于缩小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洪银兴，2009：《虚拟经济及其引发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第11期。
- 洪银兴，202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属性、行为和规范——〈资本论〉的启示》，《学术月刊》第5期。
- 蒋学模，1994：《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第10期。
- 刘伟、范欣，2022：《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管理世界》第2期。
- 刘元春，2021：《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北京日报》第9版。
- 鲁品越、骆祖望，2005：《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鲁振祥，1990：《对建国初期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几个问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
- 任平，2001：《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荣兆梓，2017：《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经济研究》第4期。
- 谭洪波，2022：《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光明日报》第16版。
- 许均华、高翔，2000：《虚拟资本与实质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研究》第3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2009：《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经济研究》第11期。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Summary: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multiple superpositions.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CPC puts forward a major conclusion that regulates and guid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n our country,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capital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clarifies the main direc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capit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capit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capital policy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capital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the unity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logic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nalyz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runs through the course of China's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guides China's capit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capital theory constructed by Marxism-Leninism as the materialized production relation and the capital theory with dual attributes, this paper giv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existence, the objective inevitability and the situational necess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further explains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ory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CPC has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and its capital policy has also gone through the stage of denying and eliminating capital—the stage of supporting and operating capital—the stage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capital, which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aw of capital and the capital policy. Particularly, in the stage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capital, the CPC insisted on taking Marxism as the guide and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Capital policy revolves arou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enhancing the regulations of monopoly and preventing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ower, the economic “departure from reality to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ket monopoly have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solve these new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n our country, we must consolidate the practical guarantee of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e to the practical basis guided by the capital theory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practice the people-centered practical principle; insis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e purpose.

Keywords: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triple logic